





中国历史故事

(五十二)

邱松明摇主编



目摇摇录

诗界革命·····	员
甲骨文的发现·····	缘
“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	愿
义和团在战火中成长·····	员
直、鲁两省烽火遍燃·····	圆
长驱向京师·····	猿
廊坊大捷·····	猿
门户开放政策·····	源
东南互保·····	缘
自立军起义·····	缘
海兰泡及江东六十四屯惨案·····	缘
《辛丑条约》的签订·····	缘
拒俄运动·····	远
火烧教堂·····	远
攻打东交民巷·····	苑
红灯照·····	愿
慈禧西狩·····	愿
《新民丛报》·····	怨
爱国学社成立·····	员
《苏报》案·····	员
光复会成立·····	员
日俄战争·····	员
中英《拉萨条约》·····	员

小说界革命.....	来源
四大谴责小说.....	来源

诗界革命

“诗界革命”，是一批标榜自由思想的维新派诗人在戊戌变法前后掀起的诗体革新运动，与当时文坛以“时务文体”、“新民体”为模式的“文体解放”，“小说界革命”，以及戏剧界的“国剧刷新”等文艺新潮，都是改良主义文化启蒙运动的组成部分，以扫荡封建正统文学的“薄今爱古”颓风，推动中国文学复兴为己任，力图以新理想使民开化，而为维新派的君主立宪、变法图存的政治纲领服务。

“诗界革命”的理论前驱与杰出实践者是黄遵宪。早在同治七年（~~1868~~1868年），黄遵宪就在《杂感》一诗中提出“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的创作原则，成为最早的“诗界革命”的宣言。《与朗山论诗》一文称“苟能即身之所遇，目之所见，耳之所闻，而笔之于诗，何必古人？”“市井”之声，‘皆有真意以行其间者，皆天地之至文也。”若“不能牵其真，而含我以从人”，“而吾心声皆他人心声”，则无诗可言。反对“尊古”、“剽盗”，要求写人间“真意”，自我“心声”。此后，黄遵宪以外交官资格，遍游日本、美、英、新加坡，长达十七年。西方资本主义的产业文明，与卢梭、孟德斯鸠的政治学说，开拓了他的视野，形成了他既批判封建专制，但又“守渐进主义，以立宪为归宿”的改良主义政治观。从而，对其后期文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光绪十七年（~~1891~~1891年），黄遵宪在伦敦作《人境庐诗草序》一文，根据“今之世导于古”的进化观点，强调

今人应抛弃古人的糟粕，而不为古人所束缚，今诗必须“别创诗界”，而“自立”于古人之后。为“新派诗”的诞生大声疾呼。文中又提出“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的重要命题，对“新派诗”的创作原则和本质特质做了完整的理论阐释。所谓“诗之外有事”，就是要在现实生活中拓展创作题材，以国内外大事入诗，更以“欧洲诗人”，“鼓吹文明之笔”为模式。所谓“诗之中有人”，就是要求诗有鲜明的艺术个性，“要不失乎为我之诗”，同时要渗透新的时代精神，塑造新的诗人自我形象。黄遵宪反对拟古，但不拒绝文学遗产。他主张“复古人比兴之体”，“取离骚之神理”，“不名一格，不专一体”，形成独立的艺术风格。在诗歌形式上，要“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即以古文家之法入诗，使诗散文化，加强诗的表现力。《人境庐诗草序》，在文学发展论、创作论、风格论诸方面都具有近代的理论色彩，是“诗界革命”的理论纲领。黄遵宪自称其诗为“新派诗”，梁启超则称黄为“近世诗家三杰”之一。康有为序《人境庐诗草》称“上感国变，中伤仲族，下哀生民，博以寰球之游历，浩渺肆恣，感激豪宕，情兴而意远”。黄诗是晚清诗坛中，继龚自珍后的又一高峰，《悲平壤》、《哀旅顺》、《哭威海》、《台湾行》、《渡辽将军歌》、《聂将军歌》等诗，确实已“弃史籍而采近事”，洋溢着爱国反帝精神，是“诗界革命”的实绩。《今别离》、《登巴黎铁塔》、《樱花歌》、《锡兰岛卧佛》等诗，写域外生活，为晚清诗开一生面。

黄遵宪之后，约光绪二十二年（~~1896~~1896年），二十三年（~~1897~~1897年）间，夏曾佑、丘逢甲、谭嗣同、蒋智由、金天羽

等相继竟为“新诗”，梁启超及一般晚清文学编年，据此界定“诗界革命”的勃兴，即在此时。夏曾佑、谭嗣同之诗，被梁启超批评为“操扯新名词以表自异”，并无实绩可言。甲午战后，丘逢甲崛起台湾。论诗与黄梁接近，称“新筑诗中大舞台，侏儒几辈剧堪哀。即今开幕推绅手，要选人天绝代才”，希望有“神手”领袖“诗界”。丘逢甲主张新诗要开拓新视野，寻求新题材。以史学为诗，寓兴亡之感，则是他所追求的理想境界。丘逢甲曾亲率军民，御倭寇于台海，失败后内渡，居广东，与康有为、梁启超有所过从，与黄遵宪则为诗友。丘逢甲感事忧国，对时势之危殆，体认较深，“大禽大兽知何日，目极全球战正酣”。内渡之后，作诗一千七百余首，其中《愁云》（光绪元年）、《春愁》（光绪元年）、《元夕无月》（光绪元年）、《题兰史 罗浮纪游图》（光绪四年）等名作，抒发台湾沦陷后志士之悲愤，抨击清廷之腐败卖国，指控列强之暴虐无行，不遗余力。而上承杜甫、陆游，慷慨放言，悲凉壮美，遂震动一时，被目为“诗史”。梁启超推为“诗界革命之一钜子”。

“诗界革命”的热情鼓动者与权威理论家是梁启超。在百日维新失败以后，梁启超避地日本，先后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国风报》等杂志，继续宣传变法主张，并创为“新民体”，推动“文体解放”，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黄遵宪、康有为、夏曾佑、丘逢甲、蒋智由等人的大量新诗，以及与黄遵宪论诗通讯等文章，耸动国内，“以诗界革命之神魂，为斯道开辟新土”。“诗界革命”步入高潮。

光绪二十八年至三十三年（光绪四年至 光绪九年），梁启

超撰《饮冰室诗话》一书，专论“诗界革命”，其理论贡献是：

一、以社会进步固“远轶前代”，“并世人物”亦不“让于古”的改良主义进化观，做为指导文学革新运动的南针，坚持“文学之进化”，反对“薄今爱古”的文学退化论，认为“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将绝”。

二、总结“诗界革命”兴起后，新派诗创作的成败得失，批评“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的幼稚倾向；品评“诗界革命”诸家，以“公度（黄遵宪）、穗卿（夏曾佑）、观云（蒋智由）为近世诗家三杰”，丘逢甲为“天下健者”，“诗界革命一钜子”，黄遵宪“为诗界开一新壁垒”，从而为黄、丘奠定诗界地位，扩大诗界革命在海内外的影响。

三、继黄遵宪之后，对“诗界革命”理论进行了更富于革命性的概括。提出“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的创作原则，主张“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并“熔铸进化学家（达尔文）言”。虽然，“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保持旧风格”之说，带有“旧瓶装新酒”的不彻底性，但旗帜鲜明地要求以“新意境”，宣传“新理想”，以诗歌“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体”，而致“改造国民之品质”的社会效果，都具有进步意义。

四、肯定中国文学史上的“俗语文学”，认为“祖国文学之大进化”，当在俗语文学大发展。在散文创作上主张“言文合”，在诗歌创作上则主张诗与乐合、俗语入诗。“新歌”要斟酌于雅俗之间，以合于“讽诵”。赞扬丘逢甲“以民间流行最俗最不经之语入诗”，推许黄遵宪《出军歌》、

符号的龙骨。经过考证，王氏发现许多符号记载的是商代帝王的姓名，而且形体奇特，于是就断定这符号是一种古老的文字，这种龙骨是殷商遗物。这个传说，有许多不符合史实之处，但是有一点可以确认，王懿荣是第一个认识甲骨文的人。

王懿荣认识了甲骨文后，便开始出重金大量收购刻有文字的甲骨，在一年期间收集了一千五百片甲骨。这年秋天，八国联军开始进攻北京，清廷命王氏为总办团练，收集义和团武装效忠王室。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前夕，慈禧太后带着少数皇室弃都而逃。联军进入北京后，烧杀奸淫，王氏痛愤异常，于是在自家的花园里投池自尽。当初，王氏大量收购刻有文字的龙骨时，就曾向研究金石、古董的人透漏过，当时的金石学大师吴大澂以及叶昌炽都闻得了这个消息。刘鹗跟吴大澂关系密切，与王懿荣也有过交往，对有字的“龙骨”颇感兴趣。刘鹗，字铁云，一字蝶云，号鸿都百炼生，江苏丹徒人，是当时的一位奇人。王懿荣殉难后，王氏后人为了还清夙债，便开始变卖家产，出售家藏古董。刘鹗闻讯后，就出资将王懿荣收藏的一部分甲骨片搜购起来，约有千余片，王氏所藏的另一部分甲骨片，赠送给天津新学书院，后由美国人方法敛，编入《甲骨卜辞七集》；另有一小部分由唐兰编为《天壤阁甲骨文存》一书。此外，刘鹗还跟北京琉璃厂的古董商来往甚颇，从他们手中收购了不少甲骨片。赵执斋是位古董商，当年曾受王懿荣之托收购甲骨片，如今又为刘鹗四处奔走，收购了三千余片甲骨。方药雨是刘鹗的朋友，见刘鹗如此热心搜集甲骨，就把自己从古董商范维卿手里购得的三百多片甲骨片，转让给刘鹗。后来刘鹗又派他的

第三个儿子刘大绅亲自去河南搜罗，共得甲骨千余片。

罗振玉，字督蕴，一字叔言，号雪堂，晚年又号贞松老人，浙江上虞人。他曾于光绪二十年（~~1894~~1894年）在刘鹗家做过家庭教师，与刘鹗交往甚密，并把他的长女嫁给了刘大绅为妻。罗振玉也是位精于古董的专家，所见颇广。当他看到刘鹗所藏的甲骨片时，也对甲骨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便劝刘鹗选择一些带字的甲骨片拓印出来刊行。在他的怂恿下，刘鹗于光绪二十九年（~~1894~~1894年）出版了《铁云藏龟》。这是第一部将甲骨文著录成书的专著，是甲骨学的开山之作。

当甲骨片流传于世时，收集甲骨片的人还有不少。与王懿荣同时搜购甲骨片的还有天津的王襄和孟定生。王、孟两人最初搜购到甲骨五六百片，后来王襄在京津两地陆续搜购到四千余片甲骨。此外还有清朝大臣端方。除了中国人以外，西方在华人士也开始搜集甲骨片。光绪二十九年（~~1894~~1894年），美国驻山东潍县传教士方法敛和英国浸礼会驻青州传教士库寿龄在潍县合伙搜购甲骨片，此外德国在华人士威尔茨、日本人西村傅、加拿大人明义士等也都广泛搜集。

在甲骨片流行初期，甲骨片的收藏者和研究者都不知甲骨片出土的确切地点。那些古董商人自然知道，但是他们见有利可图，就把真正的出土地点隐秘起来，有时诡称出自河南的汤阴，有时又说出于卫辉，致使当时的学者都受骗上当。刘鹗在《铁云藏龟自序》中说：“龟版已亥岁出土在河南汤阴县属之牖里城。”罗振玉在《殷商贞卜文字考自序》中也说：“光绪己亥，予闻河南之汤阴发现古龟甲兽骨。”后来，罗振玉经过四处询问，才知道甲骨片并非出自汤阴、

卫辉，而是出土于安阳西北五里的小屯村。光绪三十四年（~~1908~~1908年）罗氏从山左估人范某处得知甲骨文出土地是“洹滨之小屯”。于是就派人去安阳搜购甲骨文，民国四年（~~1915~~1915年），他又亲赴安阳做实地考察，确定了小屯村是甲骨的出土地点。后来李济对小屯村做了一番认真考察，著文对小屯村做过这样的概括：“现代小屯村的原始远在明朝；在这几百年中，村民在这地方建过房屋，挖过井，种过树，埋过人，他们在低的地方堆过垃圾，为种地的方便，把高的地方铲平了。甲骨的发现就是由于农人挖地及铲地。”甲骨出土的地点确定后，便开始了有目的的科学发掘。

“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

中华民族从沉睡状态中被痛苦、灾难、劫掠、屠杀唤醒过来了。正像恩格斯 ~~1857~~1857年 缘月在《波斯和中国》一文中所说的：帝国主义的大炮和海盗政策，“已经引起了一切中国人反对一切外国人的普遍起义”，“在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所表现的那种狂热态度本身，显然表明他们已觉悟到古老的中国遇到极大的危险；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

当然，新纪元曙光的出现，需要中国人民反复地进行浴血奋战。

从太平天国起义被帝国主义和清朝封建统治者镇压后，至 ~~1900~~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其间近五十年中，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大规模斗争连绵不断，此伏彼起。

到了九十年代初，四川大足、长江中下游和热河朝阳（今辽宁朝阳）又先后爆发了大规模反洋教武装斗争。其中1895年11月热河朝阳金丹起义，一个月之间，几百人的队伍发展成万人大军。起义军公开地举起消灭侵略者、消灭传教士和推翻清政府的旗帜，惩办作恶多端的传教士和教民八百余人，同时惩处了一些地方官吏和反动蒙古王公。清政府调集了直隶、热河、奉天三省军队“围剿”两个月，经过大小数十仗，才镇压了这次起义。二万多起义群众被残杀。以后很长时间里，清政府还余悸在心，时时感到隐患未已。

1895年12月，四川成都发生大规模反洋教斗争；由成都而嘉定、叙州、新津，打毁教堂七十多处。同年八月，福建古田的秘密结社——“斋教”发动群众，焚毁教堂，杀死外国传教士十余人。

1895年至1896年间，两湖、四川、江苏、江西、安徽、贵州、山东等省反洋教斗争连接不断。

1895年广西天地会起义，宣称：由于外国侵略者强横掠夺，我民脂民膏被他们吸榨净尽；我们一定要赶走洋人，夺回中国人生存的权利。

1895年，四川大足县农民又一次发动武装起义。起义军在檄文中历数侵略者的罪行，号召驱逐洋教士，以“剪国仇”，“除民害”，在四川影响所及达二十余州县，焚毁教堂二十余处。

正是这样频繁的人民起义和斗争，为大规模的义和团运动作了历史的酝酿和准备，使得它一揭起义旗，就在广大群众中获得热烈的支持和响应。

义和团原名“红拳会”、“义和拳”，是山东、河南一带

农民长期进行反对清朝统治的一个秘密结社，又是江湖游民和贫苦劳动人民在政治经济上的互助团体。它是白莲教别派八卦教的一个小支派。八卦教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在山东、河南一带从事反清活动。乾隆中叶，曾被清政府破获，教中许多重要人物惨遭杀害。此后，徒众散往直隶、山东、河南、江苏、安徽各省，继续在民间私相传习。到嘉庆年间，它的势力已经相当壮大了，支派也愈加繁衍。1796年（嘉庆十七年），八卦教天理会起义，震卦教首领李文成和坎卦教首领林清联合进攻北京皇宫，谋求夺取直隶、河南、山东三省，提出了“反清复明”的口号。这次起义失败后，清朝政府就在各地大规模搜查教门。仅在直隶一省，被破获的教门就有大乘教、金丹八卦教、义和门教、离卦教等十几种。义和拳也遭到疯狂的镇压和杀戮。清朝统治者还特别发布谕旨，命令将各教门首领全部处以绞刑，有的人还被处以最野蛮的刖刑；从犯则流放边疆，还要严格搜查所有被捕人的住家。务令严加惩处，不留根株。尽管这样，义和拳仍然是1813年捻军起义失败后，人民反清斗争最强大的势力之一。

1813年，以朱红灯和本明和尚为首的一支义和拳，在山东恩县、平原、高唐、茌平等地揭竿起义。从这两个首領的姓和号来看，起义有明显的“反清复明”性质，仍然具有义和拳前期斗争的传统。但是“反清复明”的口号，已经和当时的实际形势不相适应了。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民族危亡迫在眉睫。这使义和拳的斗争由“反清复明”，转向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于是，义和拳举起了“灭洋”的旗帜，在农村中广泛发展自己的组织，带领群众展开了声势浩

大的反帝斗争。

义和拳曾传言在北京温泉山煤洞中，挖出明朝刘伯温（即刘基）所书的一块石碑，碑上刻有预言：“最恨和约，误国殃民，上行下效，民冤不伸”，指出帝国主义迫使清政府同它们缔结不平等条约，攫取土地和赔款，使中国人民陷入极度的苦难之中。义和拳扬言要派“红灯照”“远赴东洋，索还让地并偿二万万之款”。

义和拳在揭贴和乱语中指出：“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义和拳还揭开了帝国主义伪善的宗教画皮，指出：“劝奉教，乃霸天，不敬神佛忘祖先”，“天下奉教多，不把情理说”。侵略者要霸占中国的地、人民的天，这是中国人民所绝对不能容忍的。义和拳号召群众武装起来，“感动人心枪刀排”，“自带口粮来，除国之大害”。

义和拳提出“灭洋”的口号，把帝国主义者及其帮凶分为三类：凡洋人都叫做“大毛子”；教徒等叫做“二毛子”；办洋务、充买办以及供洋人役使的中国人，都叫“三毛子”。所以呼做“毛子”，乃是斥骂之为禽兽，以表示对他们的切齿痛恨和蔑视。

义和拳还借预言斥责为虎作伥的清朝官吏们“羽翼洋人，趋炎附势，肆虐同群”。义和拳还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朝廷，扬言要得一龙二虎头：一龙指光绪皇帝，二虎指李鸿章和庆亲王奕劻。当然，他们暂时还没有识破操纵那个傀儡皇帝的慈禧才是罪魁祸首。李鸿章和奕劻两人多年来襄助慈禧，干尽了卖国求荣的勾当，一向为中国人民所深恶痛绝。义和拳散发传单警告奕劻：“你既吃了中国的俸禄，反与外洋助力，此如不改，悔之晚矣。”

义和拳利用拳术进行鼓动宣传和组织工作，宣称它有“神拳”，可以练就奇技；练成之后能善避枪炮，刀枪不入，杀敌斩寇，所向无敌。他们中也确有些人武艺精湛，更增加了群众对于依靠“神拳”打败侵略者的信心。义和拳在揭帖中宣传：“神出洞，仙下山，扶助人间把拳玩。兵法易，助学拳，赶走鬼子不费难。”这些宣传，收到极大成效，“传单一出，千人立聚”。

义和团运动中的浓厚的迷信色彩，是中国长期封建统治的必然反映。但拳民们由于对帝国主义强盗的刻骨仇恨和对祖国的无限热爱，敢于用拳棒去抗击强大的侵略者，这种英勇无畏的精神是可歌可泣的。他们的斗争是正义的。

义和拳没有建立统一的组织和统一的领导机构。它的基层组织是“坛”。一般一村的拳民组成一个坛，各坛独立地进行活动。坛口一般称坛场或拳厂，为集会议事、操练比武的场所，也是义和拳各支首领“拜坛”的所在地。有的地区，几个或十几个坛口之上，还设总坛口。各总坛之间，没有固定的组织联系，当斗争需要联合行动时，就发出“帖子”，互相邀请。一般是由较有声望的大坛出面邀请，并统一指挥战斗。总坛口的负责人称为老师，一切军政事务及出战领队等，都由老师决定、指挥。坛的首领有大师兄、二师兄等名目。大师兄为正，二师兄为副。大师兄不在时由二师兄代行职权。由于有着共同的目的和要求，参加义和拳的群众“个个拿起刀，见了鬼子往上窜，刹的刹，砍的砍”，显示出战斗的自觉和勇敢。当然，由于没有统一的组织和领导，因而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战斗力的发挥，容易受混进来的敌对分子的影响，甚至有的坛为地主豪绅所篡窃和把

持。

义和拳由农民、手工业者、船工、车夫和士兵等组成。

清朝地方官吏吴永写的《庚子西狩丛谈》中说道：“自从基督教传入中国，农村善良之辈，十有九人受其欺凌。老百姓恨之刺骨，于是相率投入八卦教（义和拳），这样可以稍为结成团体，人多势众，以与之相对抗。”

当时文献记载：拳民“俱是乡间业农……之人”，“皆农家者流”。他们平时受尽欺压，无处伸冤，一旦听到义和拳的宣传，看到他们路见不平，“不惜躯命代为申理”的义举，更加希望学会“神拳”，狠狠打击侵略者和压迫者，以免受欺凌和压榨。这样，他们乃相率参加义和拳，走上反帝斗争的前线。

京津、芦保、胶济等铁路的建成，南北轮船海运的通航，外国轮船来往穿梭于我国沿海各港口。千余年来沟通南北的大运河，很快遭到废弃，祖祖辈辈依靠运河为生的船民和其他劳动者的生计被剥夺。日益增加的进口洋纱、洋布和洋货的倾销，又使农民家庭手工业和城乡各类手工业受到严重破坏。当时失业人口达百万以上。这些人既痛恨帝国主义夺去他们的生活来源，使他们流离失所，衣食无着；又目睹或身受洋鬼子的践踏、欺凌和侮辱。因此，他们热烈拥护并踊跃参加义和拳的斗争，成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义和拳在斗争过程中，也曾得到清军部分士兵的支援。清朝募集的兵士，很多是破产的农民和失业的工人，他们同情义和拳。

此外，义和拳还发动妇女参加斗争行列，其中以“红灯照”最为活跃。